

躁進的匪共外交

立花丈平著
孫震芳譯

共匪實行文化大革命後，與蘇俄、印尼、印度歧見日深，在亞洲的外交實已到了窮途末路，其對越戰、香港暴動的強硬態度，似有更自陷孤立之感。

共匪的外交係基於三大原則：

○與蘇俄等諸社會主義國家的密切合作。

○以和平五原則與非共國家共存。

○反對帝國主義，新舊殖民地主義。

由於匪俄互爭領導權的思想鬥爭，雙方形成敵對狀態。匪印（尼）軸心因蘇卡諾的倒台而破裂；因恩克魯瑪政權的崩潰而失去了在非洲的立足點，與亞非各國的關係漸趨疏遠。因此匪共外交的①②原則完全失敗。關於越戰，匪指美國為第一號帝國主義，意圖領導世界輿論反美，其結果相反的世人認為匪共的好戰態度阻礙了越戰的和平解決。港九暴動事件，匪共雖然猛烈指責英國是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的國家，但是支持匪共反英鬥爭的國家則很少。如此匪共的第三原則又失去了效用。

匪共在「亞非團結」的號召之下，企圖滲透所謂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但這些國家鑑於匪內外的混亂而深自警戒，尤忌中共的「中華思想」與「大國主義」作風。歷史上支配領土地區的廣大與匪相彷彿者首推羅馬帝國。然而兩者都自認是文明世界而不把其他國家同等看待。這種落伍的想法仍潛在於匪共的思想之中。擁毛派說如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戰略不正確的話，共產政權就不能生根滋長。同時毛匪思想毛匪戰略應當適用於其他殖民、半殖民國家。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革命的經典。

亞洲文明古國有中國與印度。但匪並不把印度放在眼裏。共匪為了取代印度在亞洲的發言權，同時為使世人認識共匪是強者、印度是弱者，乃發動了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中」印邊界糾紛。

共匪對亞非外交的三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匪偽政權到一九六二年秋「中」印邊界發生糾紛為止，是共匪外交多彩多姿的時代。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是

萬隆會議時的風雲人物。尤其萬隆會議十原則則是基於和平五原則而製訂，因此共匪被視為頭等國。

第二階段從「中」印邊界糾紛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預定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流產。由於匪俄在亞非外交利益的衝突導致感情的不睦。共匪為了排擠蘇俄於亞非會議之外，自不量力的給予亞非國家許多經濟援助。不料化了一年多的外交努力，亞非會議却流產了。可見共匪在亞非國家的影響力已大大打了折扣。

第三階段是從亞非會議之流產到現在。美國於一九六五年正式介入越戰以來，戰局步步高昇。共匪立即擺出好戰的強硬態度。一九五五年四月熱中於亞非會議的有前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尼前總統蘇卡諾；緬甸前總理宇努等人。但是尼赫魯已逝；蘇卡諾、宇努亦喪失在國內政治生命，使共匪在亞非的外交頓成癱瘓。又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達荷美、一月六日中非、二月二十四日迦納等國的軍事政變，相繼成立了反共政權，給予匪共亞非外交的一大諷刺與打擊。

由於亞非會議事實上的瓦解，不結盟國家的份子日益增多。匪共輕視這些國家外，對南斯拉夫、印度為中心的不結盟國尤為不滿。一九六四年一月印尼退出聯合國時匪共夢想與印尼合組「第二個聯合國」，很明顯的又失敗了。

匪共原以孤立美蘇為其外交重點，故不惜一切在亞非、西歐爭取與國。除一九六四年匪法簽訂友好條約略有收穫外即無任何成就。正如蘇俄頭子們所指責的匪共外交的挫折是由於毛澤東派的驕縱自滿；破壞萬隆精神的乃是共匪自己。匪法接近係基於匪俄關係的惡化。匪共為了從蘇俄輸入基本物質的不易，遂將目標轉向法國。匪法的友好親善乃由共匪採取主動，其出發點是求有助於共匪政權的經濟建設，並非爭取法國在外交上的承認。但法國的想法剛好相反。即是戴高樂意圖擴張勢力再度影響亞洲的幻想。匪共外交原想惹起亞非國家對美帝國主義與蘇俄修正主義兩面作戰，奈力不從心，反而受

到了嚴重的打擊與失望。

匪共外交的頹勢，可由聯合國投票承認匪共國家的多寡窺其一斑。承認匪共國家在一九四九年有十二國；一九五〇年有二十五國；一九五五年有二十七國；一九五六年有二十九國；一九五八年有三十四國；一九六〇年有三十八國；一九六一年有四十一國、一九六三年有四十七國；一九六四年有五十二國；年益增加。但到一九六六年匪共與中非、達荷美、迦納斷絕邦交後減為四十九國。再從匪共對亞非各國的經濟援助亦可了解匪共外交活動的低潮。如前述三階段來區分：

(一) 匪共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對柬埔寨開始實施經濟援助以來，相繼給予緬甸、寮國、印尼、錫蘭、尼泊爾、葉門、敘利亞、幾內亞、迦納、馬里等國經濟援助，匪共勢力已滲透亞非國家。

(二) 由於匪蘇關係的惡化，匪共極力排斥蘇俄於亞非國家之外。隨着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地、反蘇的口號使匪共大量增加對外經濟的援助。諸如柬埔寨、緬甸、印尼、阿富汗、阿爾及利亞、阿聯、索馬利亞、肯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剛果(布)、中非、巴基斯坦等國都接受了匪共的經援。周恩來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到迦納訪問時，提出匪共對外援助的「八原則」來引誘亞非各國。

(三) 匪共的對外經援到了第三階段情勢完全改變。匪印(尼)軸心的崩潰；達荷美、中非、迦納反匪偽政權的成立，使匪共外交陷入困境。隨着外交的失敗，經濟援助也趨於低潮。印尼、達荷美、中非、迦納，完全拒受匪共的經援。由於文化大革命掀起，使匪共的政治、經濟、社會，極度混亂。多數國家看清了匪共的醜惡面目而與之遠離。去年雖還與柬埔寨、坦桑尼亞、馬里、幾內亞、尼泊爾等國訂立新的經濟援助協定。今年二月首次與茅利塔尼亞訂立經濟援助協定。無可否認的這些成就比第一第二階段的經援已大為遜色。匪共爲了挽回其外交的失敗，想以經援爲餌引誘落後國家，但匪共的好戰姿態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暴亂，使多數與匪建交的國家有紛紛覺醒的傾向，現在受騙國家已不多了。

匪共由港九造花塑膠工廠勞資紛爭所引起的反英鬥爭極其無理。香港暴動的根本原因是小規模的勞資糾紛，誠如英國外交部在五月十六日聲稱這糾紛原可由廠方與總工會作合理妥善解決。匪共故意把這事件扯到政治問題顯

係受了文化革命與越戰的影響。去年十一月的澳門事件，匪共屈服了葡萄牙，以爲這次仍可以屈服英國，殊不知葡萄牙國力、外交手腕，根本不同。同時香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願匪共接收香港，如不了解中國人的心情，硬把「文化大革命」強施於香港，對匪共是得不償失的。

匪共外交部於五月十五日向英政府提出五點抗議聲明：①立即接受香港華籍工人及居民全部正常要求。②立即停止所有「法西斯」措施。③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工人、記者及電影攝影人員。④懲罰這一次「流血暴行」負責的全部人員，向受害者道歉，並給與損害賠償。⑤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英國政府拒絕這些要求，表明全面支持香港政府的一切措施以及依法律懲處暴徒。匪令封閉上海的領事館，當英國駐匪偽領事館人員要離開上海時，紅衛兵在機場以粗暴野蠻的不法行爲毆打領事館人員。匪共如此泯滅人性的作法，當然不能成爲國際社會的文明國家。

五月四日「人民日報」指稱卡羅維沙利會議(全歐共產黨會議)是一次叛徒們的集會。同時指責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法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等各共黨領導階層是「革命的背叛者」。

匪與外蒙的交惡係由於蒙古政府下令驅逐在烏蘭巴托高喊反蘇、反外蒙宣傳的三位共匪小學教員王治雲、陳祿、左貴義，並告知匪駐外蒙代理大使劉吉德謂不可在烏蘭巴托車站附近集會歡送這三位教員。五月二十三日有四百多住在烏蘭巴托的中國人於三位教員將要離開外蒙之際，不願托逸夫蒙古第一外交部次長的警告集合車站歡送，致與外蒙古警民發生衝突。匪僞使館人員有些被拘留，共匪要求①立即釋放無理被捕的所有中國人。②向所有被毆打、拘留的中國人道歉。③立即保障使館人員與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並保證今後絕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北平電台於同日指稱外蒙古的領導人員爲「修正主義者」。外蒙則對匪共使館人員、中國人向蒙古警民的粗暴行爲提出抗議。

烏蘭巴托車站附近事件是今年一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紅場事件的延長。從西歐回來的匪共留學生在列寧墓前高唱革命歌、朗讀毛澤東語錄，因刺激莫斯科市民而發生騷亂，烏蘭巴托事件的背景與前者正相似。

一九五五年四月匪僞副主席宋逆慶齡在第一屆亞非會議開幕前，發表了有關匪共外交的論文。其中提及「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內政的延長。」這就是

當我了解他時，我發現他有一個引人的語調和風度，是我見到最文雅的一個，他特別是在研究政治學時，顯得極聰明，我知道他正當預備黨員時期，因此他希望每樣事情均能有所表現。

從文化革命開始時，張復南很堅定的站在黨書記和黨委這一邊，就沒有另外一個學生如此的賣力，當責難造反派時，挺身而出備加保護他的領導人。他特矜自己是一個英雄的坯子，把年青而壯碩的身子置身於他敬愛的毛主席和牛、鬼、蛇、神之間，然而不幸的是他出身於資產階級；他的祖父是個商人，他的家現在仍然住在舊法租界最好的地方，他坦誠的告訴我：「他的祖母」，他苦笑着說，「時常去教堂，把錢給那迷信的騙子——牧師。」

當紅衛兵開始搜索資產階級份子房子的時候，張復南知道他家一定在名單之列，因此他也希望參加突襲隊，黨書記對他永蒙其羞之事，曾私下勸告他去北平參加革命「經驗交換」徒步串聯，如此可免除父母被清算目睹現場時自身所受的苦痛。

張復南不能成爲一個紅衛兵，這是由於他的階級成份不夠，他在研究所裏會負責一個聲勢較大的溫和派系。該一組織之政策，人數多而時間亦較長，以對抗任何形式的暴亂和攻擊十六條，主張對批判黨人應有一合理的對待。在另一方面說來，造反派準備在任何時期掃除背叛毛主席的革命羣衆所施用的白色恐怖。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元月，研究所裏的極端分子力量發生動搖，張復南以及一個萎縮的集團出來打擊異己，雖然他們原來組織被迫解體，他們的領導人遭到嚴厲的攻擊當兒，說也奇怪，我的全班學生都和他站在同一邊，餘下的人無法保衛黨書記，黨書記此時則需要人幫助，却又拒絕參加造反派。此時要他們全體公開宣稱，說他們妄自稱大，在運動中犯了很多錯誤，因此要接受自我批評。

最後（並不是四月才開始）敵對的局面瓦解了，我還在那裏時，張已換了邊，那時是我快要離開大陸不久的時候，因此他的那次講話使我一直迴旋於腦際，思潮每想到張復南內心情緒總是無法控制，他作自白時，他沉重的敘述他所犯的錯誤，他敘述黨書記是如何利用他來作爲擋箭牌，他原來是一個熱愛毛主席後來却反對毛主席，他痛哭流涕，對往事似哽塞於喉而不能出

，好似一未決犯情緒激動而指手劃腳，他的每一句話完了總是泣不成聲，整個面孔似已成了一個淚人。

另外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純戲劇性的場面，我看到一個十歲的女孩子凌辱一個誹謗他父親的人，她所說的沒有一個字是真實的，因爲我很了解，她所說的話是由我的一個學生替她事前寫好的演說詞，而這個學生幻想他是一位修辭家。話說回來，關於張復南所作的坦白我想他一定是真的，我同時相信他當時所受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很多廿歲的青年人因情感的易於衝動而藐視他們的朋友，使全體不能忍受的學生恨之入骨。

到底他是哭了，似乎哭了過後覺得很快，至少有一部份是屬於痛快的，但其餘的一部份又是怎麼樣的呢？他在他的生活中忠於什麼，他忠於黨還是那些黨員們，他能完全獲得別人的信任嗎？

以上所說的三個人都有他們一段狼狽的過去。他們雖然飽受過個人的極度苦痛，但從這裏面却也獲得了一種啓發——一種相當程度的犬儒主義的啓發。在一年以前，年青人都可以不受羈束的有這種思想，犬儒主義是共產主義所不能忍受的一種理論，而共產主義目前却又利用這種主義，因此這種主義在今日大陸上是難以根除掉的思潮。

毛匪知道這些，故在今日大陸上冒險進行文化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樂觀主義——毛匪必須在心目中據有一種確勝的把握，一直要得到證明這種勝利確已贏得，否則文化革命必定被認爲是失敗的，當無疑問。

——上接第51頁——

匪共領導者的基本觀念。所以匪共現階段的對外強硬，好戰態度是文化大革命鬥爭的延長。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越到收拾階段，其混亂越深。廣東、四川、安徽、青海、新疆、內蒙、西藏等省毛派與反毛派的武力衝突，工人與紅衛兵的糾紛時有所聞。就奪權成功已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黑龍江省、山東省、上海市、貴州省、山西省、北平市等地方來看，其混亂亦方興未艾。如此匪區由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動亂，可以看出匪共外交的日暮途窮。匪蘇閭牆被認爲是毛澤東與黑魯曉夫性格上的差異，現在匪共外交的走投無路亦可說是毛澤東性格的反映。

原文載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日本世界週報第四十八卷廿四號